

1206.4
72

现代背景下的文化熔铸

——闻一多与中外文学关系

杨 扬 著



A0974129

福建教育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现代背景下的文化熔铸：闻一多与中外文学关系/杨扬著. —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2001.12
ISBN 7-5334-3277-0

I. 现… II. 杨… III. 闻一多 (1899~1946) — 文学研究 IV. I206.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1) 第 073373 号

现代背景下的文化熔铸

—— 闻一多与中外文学关系

杨 扬 著

福建教育出版社出版发行

(福州梦山路 27 号 邮编：350001)

电话：0591-3725592 7811283

传真：3726980 网址：www.fep.com.cn

福建新华印刷厂印刷

(福州市福新中路 42 号 邮编：350011)

850 毫米×1168 毫米 32 开本 6.25 印张 151 千字 4 插页

2001 年 12 月第 1 版 2001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800

ISBN 7-5334-3277-0/I·191 定价：13.30 元

如发现本书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
请向出版科（电话：0591-3726019）调换。

目 录

引言	(1)
第一章 清华、北美学风与闻一多文化个性的形成 ...	(4)
第二章 从《死水》看闻一多对中西诗的熔铸	(45)
第三章 闻一多现代格律诗论的中西诗学渊源	(84)
第四章 30 年代闻一多先生的学术转向及其治学特点	(125)
第五章 现代学术背景下的文化熔铸 ——作为文学史家的闻一多.....	(163)
后记.....	(192)

引 言

20 世纪中国文学的发生、发展，相当重要的一个方面，便是与外国文学，尤其是与西方文学之间的交往。这种交往关系不同于中国历史上许多中外文学、文化之间的交往，20 世纪的中国文化人不只是一般地吸收外来文化，作为自己文学、文化创造的滋养成分，重要的是他们普遍以西方的文化作为价值参照，审视和批判中国的传统文化。所以，包括闻一多在内的 20 世纪中国文化人，其文化视野远远超出了中国历史上文化人的眼界。20 世纪的中国文化人，不仅读西洋书、目睹西方近代文化冲击中国传统文化的历史事实，而且其优秀分子远渡重洋，到欧洲和美国学习西方科技文化，这种丰富、复杂的个人感受，成为 20 世纪中国文学和文化最具魅力的内容之一。

探索、发展 20 世纪中国文化，是 20 世纪每一位中国文

化人面临的共同问题。鉴于中国近代“西学东渐”这样一种历史事实，可以说，20世纪中国文化人没有一个不在自己的文化创造活动中，对此问题作出个人反应的。因此，研究20世纪中国文学与文化，无法忽略对20世纪中国文化人与中外文化关系问题的研究。因为只有将这些历史人物的思想和文化探索摆在20世纪中外文化关系中来考察，才能准确地把握住对象的个性特征，才能显示出20世纪中国文化的精神风貌。当然，研究20世纪中国文学、文化与西方文学、文化之间的交往关系，不能作泛泛之论，而必须有具体实在的研究内容，我以为在研究中至少有三方面问题值得注意：

第一，20世纪中国文化人的确是抱着学习、接受的态度，与西方文化交往，但这种学习、借鉴“西学”，绝不是简单照搬西方的学术方法和思想主张。所有积极倡导“西学”的20世纪中国文化人，都是从关注、思考中国传统文化面临的问题出发，希望通过学习“西学”，开阔国人的文化视野，借鉴“西学”的经验。离开了对20世纪中国文化的这一特有现象的理解与把握，就很难理解20世纪中外文学交往关系。

第二，20世纪中国文化人对“西学”的接受，在个体之间有较大差异，这种差异充分显示20世纪中国文化人是以个人的方式和方法，学习、接受“西学”。我们必须尊重这种选择的历史性，不能简单地以保守、进步的标准来处置历史人物，而要从历史人物的思想逻辑的历史形成过程中，去体会历史人物的思想、观点。

第三，20世纪中外文学、文化交往关系，是20世纪中国文学、文化发展过程中的特有现象，这是一种时代性特征，因

此，不能将向西方学习，等同于西化过程。事实上，20 世纪的中国文化人都是在学“西学”的过程中，融新知于国故，超越于“中学”、“西学”的文化格局，创造出 20 世纪的中国文化气象。

闻一多是 20 世纪中国文化人的代表之一，他就读于清华学校，留学美国，后又担任清华中文系教授。他的个人经历，足以显示 20 世纪中国文化人特有的经历，他的思想、创作和学说，也足以代表 20 世纪中国文学和文化的发展特征和格局。无论是他的诗歌创作、诗学主张以及学术研究，都明显带有西方文化的影响痕迹，这使得他的文化创造在精神气象上，不同于中国传统文化；但闻一多的诗作、诗学和学术研究，又都是中国的，带有强烈的民族特色，他是在关注 20 世纪中国文学、文化面临的问题，是以一种博大的文化胸怀和开阔的文化视野，来关注并回答这些问题。因此，研究闻一多将使我们看到，20 世纪中国文学与中外文学关系的研究，是有多么具体而丰富的内容，这也要求我们研究者不能满足于现有的研究方法和研究结论，只有深入到历史过程的具体活动环节，掌握和体会历史材料的具体性，才会使研究呈现出更为丰富多样的精神面貌。

第一章

清华、北美学风 与闻一多文化个性的形成

在探讨闻一多与中外文化关系时，我们不能不注意到闻一多的文化个性的形成，与清华、北美学风的关系。尽管闻一多最后是以民主斗士的形象结束其辉煌的人生，但究其一生经历，闻一多还是一介书生。所谓书生，是指他的生平活动始终离不开读书、写书、教书。并且他那份认真、执著，甚至于偏于固执的人生态度，都显示出读书人的做人风格和精神风貌。而闻一多这种书生意气的精神渊源，若要作一番盘根究底的考察的话，无疑要追溯到清华、北美的学风对他的长期熏陶。^①

闻一多一生与清华的关系最为密切，得益于清华的地方也最多。他活了48岁，其中24个年头的个人生活都与清华有关。1912年冬，闻一多考入清华留美预备学校，经十年寒窗，1922年7月毕业于高等科，放洋留美。^②清华时期，正是

他接受知识，思想观念初步形成的阶段，清华严格的教育与管理，虽有苛刻呆板的一面，^③但对于闻一多一生的思想性格的影响却是巨大的。1923年为纪念《清华周刊》创办12周年，他在大洋彼岸的美国写下了长诗《园内》。诗中他记录了自己清华的学习生活，这首诗是闻一多所作惟一的一首长诗。^④如果说，十年清华生活，培养了闻一多勤奋、好思、苦学的思想个性的话，那么，后来闻一多在清华的教书生涯，则是他思想成型并传播自己思想的时期。1932年8月，闻一多被聘为国立清华大学中国文学系教授，由此开始了他自己所说的“向内转”的学术生涯。^⑤他除了教书以外，几乎所有精力都投注在研治中国传统典籍上，特别是于《诗经》、楚辞、上古神话及唐诗研究上，有所创见。但即便如此，他与清华学风的关系还是互为依存。闻一多的学术贡献，当然充实、丰富了清华人文学术的研究传统，他是清华的名教授，于清华中文系影响甚大；但另一方面，清华也影响并推进了闻一多的学术研究。^⑥在三四十年代，清华是中国人文学术研究的中心之一，当时有所谓清华的文学、北大的语言之说，即清华中文系汇集了国内许多有代表性的文学人才，故文学气氛浓，文学研究的成果及声势大，而北京大学中文系在语言研究方面人才集中，自成一格。清华大学的朱自清、王力及冯友兰、潘光旦、金岳霖、陈达、张荫麟等教授，互相间的协作，以及对学问的切磋，保持并发展了清华崇尚学术的良好风气。闻一多生活在其中，思想上有所感触，学问上当然更有长进。如果闻一多不是生活在清华这样一个人文学术气氛浓郁的环境中，是很难想象在他生命的最后14年，能够产生出那么多有

影响的学术成果。

闻一多从清华的学生，成长为清华教授，在这一过程中，北美三年留学生活，无疑是他人生的一大转折，于其思想也影响至深。^⑦这种转折，除了让他亲眼目睹北美的文化生活，亲身感受北美的文化氛围之外，最大的收获是开阔了文化视野。闻一多不仅在基本的文化价值观上，吸收了美国学者的观点，诸如对艺术、宗教等人文学学术价值的推崇，对人性、艺术的普遍性的强调，而且他注意对比中外文化的各自特点，将美国意象派诗的诗学主张、表现技法，引入自己的艺术创作及诗学理论的建设之中。北美三年留学生活，是闻一多趋向于思想成熟时期，在随后一段时间里，他进入到自己的文化探索和文化创造之中，不仅诗风变得更加成熟，而且在诗学理论及学术研究上，也进入了一个开创性的历史时期。^⑧

在陈述了闻一多与清华、北美学风的这种相互关系之后，接下来，我们进一步讨论闻一多在清华、北美时期的思想演变情况。



在以往研究闻一多文艺思想的论文中，不少研究者都提到了清华学生时代闻一多思想的演变情况，如收入《闻一多研究资料》的郭道晖、孙敦恒先生的《清华学生时代的闻一多》，其他还有闻一多当年清华的同窗好友梁实秋《谈闻一多》、浦薛凤《忆清华级友闻一多》等，^⑨这些文章结合闻一多后来被害的遭遇，在记录和描绘闻一多早年在清华读书的情

形时，都侧重于强调闻一多不屈的反抗性格，而且从现存的闻一多在《清华周刊》发表的文章看，大都是体现他对清华教育管理制度的抵触和反抗情绪。^⑩这些记录和研究有其合理之处。这种合理性主要揭示了闻一多文化个性最初形成时期，有不约于既定规范和呆板的教学管理模式的一方面。譬如，他写过《美国化的清华》一文，总结了10年在清华的读书经验，批评清华教育在管理及具体教学内容上，偏向英语教学而放松国学教学的一面。^⑪这是实情，但假若我们因此而认为闻一多完全否认清华教育对他思想个性的影响，或将清华教育完全限制在消极水平上来理解，则是有失偏颇，也违背闻一多自己的看法。闻一多毕生都热爱着清华，并以清华的良好学风引为自豪。收入《红烛》诗集中的《印象》、《快乐》、《美与爱》、《诗人》、《回顾》都是作者在清华读书时期创作的，^⑫诗中所流露的情感激越而昂扬，在描述清华的校园生活时，作者说：

九年底清华底生活，
回头一看——
是秋夜里一片沙漠，
却露着一颗萤火，
越望越光明

……^⑬

1923年3月，在美国留学已半年的闻一多，为纪念《清华周刊》创刊12周年，写下了长诗《园内》，他在长诗中描

写清华之昨日与今日，并展望了清华之明日。^[15]《园内》可以说是清华的史诗，作者尽写了清华园最初的“寂寥”，但那毕竟是极小的篇幅。诗中更多的是热烈礼赞清华园中的少年学子，在曙色晨鸡鸣叫之时，于红荷旁假山上，面对旭日，“背诵庄周屈子底鸿文，/背诵沙翁弥氏底巨制。”^[16]闻一多对清华的热爱之情，终身不变。在他遇难前不久，先期复员归北平的吴晗在与闻一多道别时，闻一多一再叮嘱吴晗，回清华园时，请先看看我旧居的竹子。^[16]差不多同一时期，在西南联大结束时的一次校友联欢会上，一说起清华，闻一多便动情地说：“我也和大家一样，怀念故乡，怀念清华园，……我在那里读书，教书，做研究工作。”^[17]

如果说，闻一多写过《旅客式的学生》、《中文课堂底秩序底一斑》、《痛心的话》、《美国化的清华》^[18]这一类批评清华的文章，甚至在晚年表示最不满意自己所受的教育，^[19]那么，闻一多同样也写过热烈礼赞清华的文章，甚至到生命最后，他还眷恋着清华。这应该如何来认识呢？

在我看来，假若我们不是仅仅停留在对个别文章的个别观点的孤立的理解上，而是从闻一多一生的思想活动及个人风格上来看待他所写的一系列关于清华的文章，我们就会发现，诸如闻一多批评清华与热爱清华、他得益于清华、思想个性与清华学风有着千丝万缕之密切关系这一连串问题，并不彼此分割，而实在是联系在一起的。

闻一多批评清华，早期主要集中在两方面。第一，是学校教学内容安排上，偏重英语，忽视国学教育。第二，是学校教育管理体制上，只顾管住学生，而不关心学生的道德情

操的培养。^{②③}这两方面的批评,是针对清华学校管理及学校教育中暴露的具体问题,进行有针对性的批评,因而,说清华大学有上述问题,的确是事实;闻一多奋笔疾书,批评上述现象,他是完全合理的。但我们没有必要将闻一多的这种批评扩大为对整个清华学校的学风及教育成就的全盘否定。闻一多自己就不是这样做的。他是清华培养出来的人才,他对清华除了深有情感之外,常以清华具有良好学风而引以自豪。在1923年3月写成的长诗《园内》中,闻一多在第三部分结束段落中,有“啊,‘自强不息’的少年啊!”这样描写学生的诗句,作者自己在诗后注释道:“不要忘了这是本校底校箴。”^{②④}在致父母亲的家信中也说,自强不息“这是清华学校底校训”。^{②⑤}这是闻一多在留美期间回忆清华对自己的长期教育、培养后,所表达的对母校的情感,这种情感在闻一多读书清华时就已经形成。1919年“五四”学生运动爆发,闻一多在致父母亲的信中高度评价清华学生所表现出来的精神风貌,信中说:“……一般学生敢冒不韪,起而抗之,虽于事无大济,然而其心可悲,其志可嘉,其勇可佩!所以北京学界为全国所景仰,不亦宜乎?清华作事,有秩序,有精神,此次成效卓著,亦素所习练使然也。”^{②⑥}1921年闻一多等因为支持教师索薪运动,参与罢考而招致清华当局开除,闻一多等绝不向当局屈服。同年7月24日他致信二哥闻家骢,在信中他称道与他一起参与罢课的清华学生罗发祖、罗隆基、钱宗堡、陆梅曾、陈长桐、桂中枢、黄钰生、吴泽霖,并说:“诸君在校皆籍籍,陈、黄(即陈长桐、黄钰生)尤为代表团中坚人物,竟肯为此牺牲赴美,足见清华之真精神非他校之比

矣。”^{②4}1922年7月，闻一多在上海乘Key Stone State号海轮赴美，旅途中即作信致清华好友吴景超、顾毓琇、翟毅夫、梁实秋，信中流露出对清华的依恋之情：“我愈加渴念我在清华的朋友。这里竟连一个能与谈话的人都找不着。”^{②5}闻一多到美国后，时时处处拿周围的中国留学生与清华学生作比较。1922年8月14日，他在致吴景超、翟毅夫、顾毓琇、梁实秋的信中又提到：“这里的（中国）学生政治恶于清华。”^{②6}他鼓励清华同学，“希望诸位朋友觉得自己的责任，为母校造点光明。我们在这里现在逢一个有脑经〔筋〕的清华同学，便讲学校里的情形；我们尽力鼓吹母校与alma mater底联络。”^{②7}

从上述所列的书信及文字材料中，我们不难发现，闻一多与清华学校的精神血脉之间，有着深厚的骨肉之情。这种关系不仅使闻一多养成了“自强不息”积极向上的品格，更在于培养了闻一多对于人文学术传统的热爱与忠诚。

二

闻一多在批评清华学风时，较多地指责清华学校当局不重视国学教育。闻一多的批评有符合当时清华教育实情的地方，但我们也必须作进一步的说明。

清华学校最初筹办时，并不是作为大学或传授国学知识的学校来办的，它仅仅是培训中国赴美留学生的一个语言培训机构，并且最初从属外交部管辖。^{②8}据1921年《清华周刊》发表的《清华园与清华学校》一文所记，1908年清政府外务

部呈交美国驻华公使的一份派送留美学生章程规定，派送留美的中国学生有如下具体规定：

质地聪明，品行端正，体格强健，清白家世，恰当年龄，中文程度要能作文和有文学与历史的知识，英文程度，能直接入美国大学和专门学校听讲。出洋学生又必经西医验过。^{②9}

根据上述要求，中国留学生赴美学习，首先要克服的是语言障碍问题。故1909年清政府外务部与学部商订建立游美学务处，1910年定名游美肄业馆。同年12月，有《外务部学部呈明游美肄业馆改名为清华学堂缘由》，将游美肄业馆改为清华学堂；1912年11月，清华学堂改名清华学校。^③既然清华学校是培训中国赴美留学生的预科学校，清华校方理所当然对英语训练要求很高，对一些英语水平明显不行的学生采取淘汰。1912年冬，闻一多刚入清华时，就因为英文水平不过关，而留级一年。^④其他如1913年入学清华的潘光旦回忆：“为了准备留美，必须全付精神用在英语的训练上，要求学生能阅读外，还要能听、能说、能写；因此，就知识传授说，程度是不可能太高的。”^⑤英语教学及语言训练，对初期清华教学来说，是首先考虑到的，而这种教学内容安排，从留美学生以后的留学情况看，确实是行之有效的。差不多所有1924年以前留美的清华学生，在他们后来的回忆文章中，都没有提到留美时，在语言上遇到过什么障碍。相反，倒是都提到他们初到美国后，英语水平都令美国教授满意。^⑥如，早年清

华毕业生吴宓，到美国留学，进哈佛大学本科学习。哈佛专管入学的工作人员认为外国学生英语水平一定很差，但吴宓出示自己所撰英语论文、作文及笔记，改变了哈佛英文委员会对他的看法。^④其他如清华1918年戊午级毕业生张鑫海（后改名张歆海）、楼光来，都因为英文出色，到美国 Johns Hopkins 等大学学习，一年即大学毕业，获文学士。^⑤

与上述语言训练要求相适应，早期清华的师资物色，主要是着重英语水平，故教师来源主要是两方面，一是外籍教师；二是一些留学回国或教会学校毕业的中国人。^⑥由于学校重视英语，所以，英语课成为全校师生最看重的课目，在教学安排上，都安排在上午时间，而其他辅助性课目，均放在下午时间。^⑦学校的这种教学安排，自然使得英语及会说英语的教师地位得到提高，而同样在会说英语的人中，则又是以英语为母语的外国人地位最高。这种等级在清华很明显的以不同物质待遇形式表现出来。据冯友兰先生回忆，清华教师住宅区有四块。第一住宅区叫“三所”，这是学校三巨头（校长、教务长、秘书长）住的。第二住宅区是北院，又称“美国地”，都是洋房，供外籍教员住。第三住宅区是南院，一部分是洋房，一部分是中国式房子。第四住宅区是西院，全是中国式房子。照当时规定，外籍教员都住洋房，中国教师中，会英文并教授英文的待遇就高，国文教师及其他地位较低的教职员，住中国式待遇较差的房子。^⑧如果说，偏重英语教学这在当时社会上已经是较为新奇的事了，那么，这种因教学内容不同而带来物质待遇等级不同的现象，很容易引起中国教师及学生的反感。多少年后，凡清华毕业的学生，对这一

点记忆犹新，也深恶痛绝。一些有正义感的学生和教师，当然要提出批评意见，但他们的表现形式，除批评清华是“美国化”的清华外，很重要的一点是要求国学在清华教学内容中应占有一席之地。^{③9}假若我们翻阅一下早期清华学生刊物《清华周刊》，便会看到，批评“美国化”的清华，强调国学的重要性，几乎是一种普遍的呼声。闻一多先生在其中也刊发了《论振兴国学》、《中文课堂底秩序底一斑》、《恢复伦理演讲》、《美国化的清华》等文章，文章中所阐发的观点，也与同时期《清华学刊》上吴宓、汤用彤、罗隆基、潘光旦等人的文章看法大致相同。^{④0}

早期清华学生对本校国学教育不力的批评，固然是对清华教学的批评，但实际上更多地反映出清华学校在办学过程中，逐步意识到单一型的语言训练的培养目标，已远远不能适应学生的要求，因而清华学校也逐步的由留美预备学校向传授知识、培养人才的现代大学发展。^{④1}

在这里我还想说明的是，清华学校的早期毕业生，有不少人都批评清华聘用的国学教师迂腐无能，因而很多后来的研究者也延用这些印象材料，认定清华早期的国文教师缺乏学术。^{④2}事实上，清华早期聘用的一些国文教师，都还是有相当国学根底的。像给闻一多上过课的饶麓樵先生、陈曾寿先生、赵瑞侯先生，其他如马季立先生、徐锦澄先生，都是有相当深厚的学术功底。据吴宓回忆，饶麓樵先生原为京师大学堂文学、史学教授，是饶先生最早给吴宓看王国维的《颐和园词》、《蜀道难》，并称道此是佳作。^{④3}1918年年底饶先生病逝，闻一多在日记中记有“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饶师麓樵